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主编 黄德宽

杨 军 · 卷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主编 黄德宽

杨军·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杨军卷/杨军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664-0200-4

I. ①安… II. ①杨…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7062 号

AN HUI DA XUE HAN YU YAN WEN ZI YAN JIU CONG SHU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YANG JUN JUAN

杨军卷

杨军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mm×240mm

印张: 16.75

字数: 287千字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ISBN 978-7-5664-0200-4

策划编辑: 康建中

责任编辑: 徐建 程尔聪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刘运来

美术编辑: 李军

责任印制: 陈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总 序

黄德宽

汉语言文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学科,这是一门渊源久远、积淀深厚的学科。对汉语汉字的研究,我国先秦时期即已肇绪,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言文字学,其历史大体上也只有百年左右。

安徽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较快成长进步的。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目前这个学科不仅能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等高层次研究人才,同时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之一,在教学、科研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是本学科诸多先生艰苦努力的结果,对他们的学术贡献我们不应忘记。总结发扬他们的学术精神和学科建设经验,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的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启动编纂了“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共 10 种,入选的 10 位教师是对本学科发展做出贡献的众多教师的代表,他们基本上是本学科各个方向的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各卷所收论文也基本上反映出各位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代表性成果。除已经谢世的先生外,各文集主要由作者本人按照丛书的编选宗旨和要求自行选编完成。

在编纂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到底如何开展才是应该提倡的?学科建设最为关键的要素到底有哪

些？对这些问题，我担任学校校长期间没少讨论过，时下我国高校关于学科建设的经验也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沉静下来，就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来看，我认为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以下几点：

一是要以人为核心，尊重学者的学术追求。学者是学科的载体、建设者和开拓者。学科的发展主要靠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和以他们为主组成的团队。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学科建设思路，就要尊重学者，尊重他们的精神追求、研究兴趣和个性特色，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不是用考核的杠杆和行政的手段迫使他们按设定的路径行事；那样很容易扼杀学者的研究个性和兴趣，也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研究特色和重点，几乎都是各位教师自身研究领域的自然体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形成自身的研究风格，探索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因此能不为流俗左右，远离浮躁喧嚣，耐得住寂寞，甘愿坐冷板凳，最终取得累累硕果。

二是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教学科研相得益彰。大学最根本的职能是培养人才，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将教学、科研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教师，长期以来坚守在人才培养的第一线，他们将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人才培养上，而且大家都很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像何琳仪先生就是在讲台上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近年来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而且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成绩突出，培养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在学校合作共建的孔子学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翻看这些文卷，不难看出，将科研与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密切结合，用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内容，结合教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是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教师的共同特点。一个学科建设的成就，既要科学研究，更要看人才培养。围绕人才培养的学科建设，应该是大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一点我以为是大学学科建设尤为值得重视的。

三是要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学科建设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人文学科的发展关键是学者队伍的集聚、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研究领域及特色的形成,更需要长期的努力。因此,开展学科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只寄希望于挖一两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而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学科建设应该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通过创造环境、精心培育,让其自然而然的生长。近年来,许多高校将学科建设当重点工程来抓,纷纷加大投入,不惜代价争夺人才,虽然也可以见效一时,但是从长远看未必能建成真正的一流学科。这方面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成长,尽管也得到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不过在实际建设中,我们还是坚持打好基础,通过持续努力,不断积累,逐步推进。我们深感,这个学科目前的状况离国内一流高水平学科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我们相信,只要遵循规律,持之以恒,其持续发展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四是要开放兼容,培育良好学风。学科建设应该注重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培育。强调自身特色和优势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要通过学术交流不断开阔学术视野,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情怀向海内外同行学习。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较为重视学术交流,各学科方向的带头人或骨干,先后在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训诂学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音韵学会、华东修辞学会、安徽省语言学会等全国和地区性汉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兼任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等职务,促进了本学科团队与国内同行的交流。同时,我们重视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不仅经常性邀请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交流,还特聘著名学者参与学科建设,承担教学科研任务,逐步形成开放兼容的学科建设格局。丛书中收录的高岛谦一、陈秉新、李家浩三位先生就是本学科的长期客座教授或全职特聘教授。开放兼容的学科建设思路,其核心就是要将学科建设放在本学科发展的总体背景下,跟踪学术前沿和主流,形成学科自身学习和激励的内在机制,并确立自身的发展目标、特色追求和比较优势。学科建设要实现开放兼容,要注意协调和处理好学科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这不只是要处理好相关利益关系问题,还要形成学科发展的共同理想,尤为重要的是

形成优良学风。优良的学风是学人之间合作共事的精神纽带。一个学科只有崇尚学术、求真务实蔚然成风,学科成员才能做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相互兼容。良好的学风,也是学科赢得学术声誉、同仁尊重和开展合作交流的基础。这一点应该成为汉语言文字学科建设长期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人文学科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最让人文学者神往的,当然是产生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师,形成风格独特的学术流派。在当前社会和教育背景下,这好像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但我以为,只要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遵循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规律,经过代代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追求,在一些有条件和基础的高校将来产生新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人文学科学派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还有一大批默默奉献的教师和很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他们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生力军。我相信,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对他们也是一个激励和鼓舞。见贤思齐,薪火相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必将促进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

2012年立春于安徽大学磬苑

前 言

这本论文集收录了 23 篇文章,大致可以反映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范围和兴趣。走上学术道路,不能不提 1977 年恢复高考。这次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的命运。对我来说,正是这次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出身在一个书香世家,先曾祖次典公(讳兆麟)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二(1906)年任翻译局副局长,同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两年后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记名提学使,在任候补道,浙江嘉兴府知府加五级,二品衔。宣统三年(1911)诰封资政大夫。辛亥革命时,他避居上海。民国三年(1914)回遵义,担任《续修遵义府志》总纂。民国六年(1917)作为国会参议员赴广州参加国会非常议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开始“护法战争”。民国八年(1919)病逝广州,终年 48 岁。归葬老家金鼎山下玉石坝,孙中山为其题写墓志。有遗著传世。

曾祖父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交谊甚笃,在他给太炎先生的书信里,曾提及他们在日期间,为“朝夕过从,虽救国之见彼此不同,而文字之相资,道德之相契,其欣和盖无与伦比”的挚友。

因为曾祖父先后任过正安、仁怀两县的书院山长,后又任遵义书院的山长,当地人为区别其他杨姓,把我们家叫做“书院上杨家”。又因为曾祖父是《续修遵义府志》的总纂,所以在当时的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都有一些影响。

到了我这一代,家族荣耀已然不再,父亲又是远近有名的“右派”,被送到偏远的农场改造。可我自幼喜爱读书,大概是因为好奇,我会经常翻阅家里的藏书。家里的旧书、字画等虽然早就被父亲捐给了遵义图书馆,但家里还

存有部分在当时不犯禁忌的书籍。在七八岁时,我已将鲁迅的《故事新编》读得很熟,甚至还会为小伙伴们讲故事。在初中时期,学校经常组织下乡劳动,到了晚上,同学们也会缠着我为大家讲故事。

初中毕业以后,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和自己的“小反革命”历史,我被剥夺了进入高中的权利。在一个农畜场做了一年临时工后,终于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进入贵阳的一家饭店做学徒工。不过我对烹调始终没有兴趣,非常向往能够做一名无线电方面的工人或者技师。于是我买来一些无线电方面书籍自己学习。刚开始,还能看明白一点,但越往后数学公式越多,当然也就看不懂了。这时候书店正好有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其中有《代数》、《几何》、《解析几何》、《物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我就一点一点通过自学,学完了前面4种。没想到这竟对我后来顺利通过高考起到了关键作用。我有个特点,就是会为兴趣所致而“痴迷”。我在学习数学时,为了解出一道难题,可以好几天废寝忘食。在家里解不出,就带到饭店,用写菜牌的小黑板来演算。师兄弟还为此给我起了“科学家”、“疯子”之类的外号。当时,我们一家挤在一间不足15平米的小房内,自然有诸多不便。于是借了邻居一间堆煤的屋子,隔出半间做我的卧室。房间紧邻厕所,没有窗户,一开门,臭气熏天。我就关在这间屋里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许多世界名著,抄写了龙榆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等,还制造了好多用麻袋装的演算草稿。在这期间,我还喜欢对一些问题穷根问底。比如我看到有些书上把古文中的“造物”解释为“自然”就大为怀疑,心想古人心目中的“造物”应该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属性。果然,后来读《老子》,知道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学说,更加相信读书不可以盲从。

到了1977年夏天,我受单位差遣去遵义买电磨,在火车上突然听到广播里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感到机会来了,我终于有了再次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可能了。由于理科考试要考化学,这是我的缺项,所以选择了文科。考完试,我信心满满,知道录取不会有问题。初选以后就要填报志愿,但是当时没有招生简章,更不知道哪些大学到贵州招生,再加上“出身”有问题,我就报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贵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川大录取时,省招生办打电话到单位,要我重新送一份“政审”材料到招生办去。但

是我因政治审查没过关，没有被川大录取，最后被录取到贵州大学中文系。

70年代末的大学里，学习氛围非常浓厚。“科学的春天”到来和“四个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促使当时的青年学子为自己、为国家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希望能在国家实现宏伟蓝图的过程中尽一份力。在大学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学识渊博的学问家，遇到两位改变我一生的导师——李晔先生和蒋希文先生。李先生姓胡，原名迺廉，因为在《广韵》里“廉”是“力盐切”，力在上古音属之部入声，“李”是跟它相配的阴声字；“盐”是谈部阳声字，“晔”是跟它相配的人声，所以就用古音代替了自己的原名。先生是安徽泾县人，个子不高，瘦瘦的，留着浓黑的“一字胡”，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蓝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系上的。在上大学期间，我跟先生接触不多，他只为我们讲授了一门“文字学课”。我上课的座位是在第一排，有些时候总忍不住要跟邻座的同学议论一下，所以落了个上课爱说话的坏名声。但是我在李先生的课上从来没说过话，因为他的课内容很多，稍不注意就会“坐飞机”。后来他告诉我，系里研究留校名单时，他问：“杨军是谁？”别的老师告诉他：“上课最爱讲话的就是。”不过他还是想不出“最爱讲话”的是谁。蒋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江苏赣榆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我还记得他说“我家有只鸡”，其中“家”和“鸡”的声母都颚化为舌面塞音c-。他告诫我们在中文系学习，有两门语言课一定要学好。一是古代汉语，这是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一是外国语，这是我们中国人与国际沟通的重要工具。他为我们讲授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形式逻辑和汉语音韵学等课程。蒋先生上课非常投入，至今与同学谈起他讲授《哀江南赋序》时动容的情形，大家都还记得。先生很健谈，同学们都喜欢跟他聊天。我记得他把自己《书目答问补正》带来，要我们认真念，好几位同学还利用课余抄写了一遍。在这4年里，我除了上好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外，还抽时间大量阅读、记诵古书。比如《诗经》、《楚辞》基本顺着背，《左传》选背，《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也是基本全背。

1982年元月，我毕业留校分配到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先秦文学。一天，我到系资料室借了郝懿行的《尔雅疏证》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在楼梯上遇到蒋先生。他问我借的什么书，又问了当时一些情况，然后说：“你教先秦文学，必须去拜一个老师。”我问是谁，他说：“你去找李晔老师，他是我们学校学问最大的，他能教会你很多东西。”我有些迟疑，心想，李先生学问太大，而

我基础又差,他肯收我吗?蒋先生说:“你别怕,我安排你去给他整理书籍,然后就可以向他请教了。”这件事我一直感激蒋先生,他不仅自己教了我许多年,还让一位学识渊博、精通国学的老师指导我学习了15年。在李先生门下,我认真读完了《毛诗》和《说文解字注》。然后按照先生的指示,把《集韵》与《类篇》详加比较,同时每天还要坐在他面前按照指定抄写一些古书和一些要我精读的文章,如帛书《易经》、《段砚斋杂文》等等,多少年一直如此。所以我读书逐渐养成了抄写和做笔记的习惯,后来还抄写并重新编排了江沅的《说文解字音韵表》,还在阅读《经典释文》、前四史、先秦两汉诸子时做了大量的笔记。在这个过程中,李先生要我跟蒋先生学好音韵学,参加方言调查。我学音韵学跟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样。在念《说文解字注》时,我就跟着蒋先生学习上古音,把段玉裁的十七部和王力先生的二十九部对比,参考董同龢的《上古音表稿》,然后为每一个字标注上《广韵》的反切和中古音韵地位。因为自己当时没有《广韵》,图书馆借书额度又已借满,蒋先生就要我每周六上午到他家里去查阅。蒋先生一直很关心我的成长。记得有一天傍晚,他到我住的单身宿舍来,手里拿着两本线装书,放到我桌上,说:“你抽时间好好读读,最好能抄下来。”我翻开一看,是王引之《经义述闻》的《通说》。还有一次,他到西雅图参加汉藏语学会会议后,带回很多资料,选了一部分带到我宿舍要我读。在两位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除了完成教学以外,大部分时间得以专心致志地系统研习。1983年夏和1984年夏,我还两次随蒋希文先生到安顺和黔东南调查汉语方言。在这以后,我和涂光禄兄成为搭档,几乎每年都一起下乡调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是系统的专业训练,而这些训练又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说说这部论文集。这个集子大致包括音韵研究、训诂研究、音韵文献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另有一篇是方言语法研究。

音韵研究的论文有一篇是讨论《集韵》“牙喉音”声母反切上字分用问题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先师李晔指导下做《集韵》与《类篇》、《广韵》等音韵文献比较研究时,读了白涤洲先生的《集韵声类考》。白涤洲先生在这篇论文里指出了《集韵》反切上字的一些特点,但他没有采用他分析《广韵》声类时使用的“分等统计法”,而是沿用了陈澧的“系联法”,原因在于他认为《集韵》的反切上字不能分等统计。我仔细考察了《集韵》牙喉音声母的反切用字

情况,感觉只要把白涤洲先生的“分等统计”稍加修改,还是可以用来分析《集韵》声类的。于是我将等第与开;合口同时作为《集韵》反切上字出现的条件,分别考察不同反切上字出现的情况,参考“系联法”,得出将《集韵》牙喉音声母反切上字分为Ⅰ一二三等开口、Ⅱ一二三等合口、Ⅲ四等与重组四等开口、Ⅳ四等与重组四等合口四类的结论。这种分用跟《切韵》、《广韵》的反切上字一二四归为一类、三等为一类的分用趋势差别很大,既反映《集韵》反切改良的现象,也反映出《集韵》反切上下字更重视-w-介音的和谐,而不再是-j-介音的和谐。这是我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986年,我随蒋希文先生到重庆参加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四届会时就带了这篇论文并在大会宣读,会后喻世长等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经反复修改,直到1995年正式发表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读华著〈杨雄方言校释汇证〉札记一则》通过郭璞《方言注》对“逊”字的音注“于果反”是否有误的讨论,引据《经典释文》、《篆隶万象名义》匣于两纽的交替互用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音韵文献中大量匣于混用的事实,参考其他文献的引用,证明了郭璞所注的“逊于果反”中“于”并非“乎”字的讹误。《“吐蕃”的读音问题》则以白居易等唐人诗歌押韵的事实,证明“吐蕃”的“蕃”在唐代读元韵,为伯希和的读法找到了事实根据。指出今人将“吐蕃”读如“吐波”是毫无根据的误读,并由文献中保存的大量语言材料讨论了“吐蕃”的构词特点。《四韵定本》是近代大思想家、学问家方以智的一部完整韵书,通过该书对“燕呼”、“闽呼”、“杭呼”、“楚呼”、“下江呼”等方言的排斥倾向,可以确定这是一部力图表现具有“中原”地位的官话韵书。再就其语音特点来看,他所认可的“中原”地区官话,应该是明代江淮地区的“大南京官话”。因此,这部韵书的价值不会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之下。但由于这部韵书长期尘封,至今音韵学界极少有人知晓。《〈四韵定本〉的入声及其与〈广韵〉的比较》,首次发布了《四韵定本》入声的演变情况及其规律,对进一步研究官话的历史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有一个极其重大而至今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即《切韵》(《广韵》)系韵书的性质问题。其中最使人困惑的是这个音系到底是“单一音系”还是“综合音系”,如果是“单一”的音系,它的语音基础为何?如果是“综合”的音系,对它构拟是否可能?从现代学术界的长期论争来看,无

论持“单一音系说”还是“综合音系说”的学者,采用的材料几乎相同,而所得的结论却分歧巨大,且其内部意见也不尽相同。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用以研究《切韵》音系性质的材料是否具有足够的证据价值。从古人“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清浊”与“轻重”、“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鉞钝,得其直质,其辞多古语”之类的描写性叙述中,我们很难找到确有价值的证据,更难形成可以给出一致结论的证据链。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另辟蹊径。考虑到汉语是音节语言,我们应该从汉语本身的特点出发进行研究。对此,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性质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现代汉语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因而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性质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以最具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为材料,把其中标注有“古”(古语词)、“方”(方言词)的词以音节形式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些词在进入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时都被“折合”为现代汉语已有的音节,并未对现代汉语语音系统造成破坏或改变。再考察《汉语外来词词典》,其中收录的音译词也是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折合”成符合现代汉语语音形式的音节,以“词”的形式进入现代汉语的,也没有对现代汉语语音系统造成破坏和改变。我们绝不能因为现代汉语具有古词语(犹“古今”)和方言词、外语音译词(犹“南北”)而认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具有“综合音系”的性质。再考虑另一个因素,很多学者在怀疑《切韵》音系是“综合音系”时,往往是因为《切韵》的韵母系统比现代大多数方言的韵母系统复杂,因此认定《切韵》是一个兼包了“古今”、“南北”的“综合音系”。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汉语既是音节语言,要“综合”必然要“声韵调”一起“综合”。不可能也无法做到只“综合”韵母系统而不“综合”声母系统和声调系统。但《切韵》系韵书的35(或36)声母、平上去入4声调,从未成为“综合音系说”的质疑对象,这恰恰让人疑心“综合音系说”是否是一个“真命题”。周法高先生《玄应反切考》比较《切韵》音系与玄应《经音义》音系的相似度,用从外部类比的方法讨论“综合”的可能性,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内部分析与外部类比来考察这个问题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思路、方法和材料等方面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创新和更新。从多年前开始,我就指导研究生以音节为单位,分别对《切三》(S2071)、“王三”、“王二”、《广韵》等韵书的

“又音”进行研究。我们假定一个词只有一个语音形式,如果同一个词有两个或以上语音形式(“又音”),那么,其中就有一个或以上的“冗余”成分来源于其他方言或语言;如果这些“冗余”成分可以通过“折合”而进入原有语音系统(音节系统),那么,这种外来成分的进入并不对原语音系统造成破坏。如果这些外来成分使原有音节系统的音节数有少量增加,那么,也不会对原语音系统构成破坏。除此而外,我还指导研究生对《史记三家注》、《汉书音义》、《晋书音义》、《文选李善注》、《经典释文》等随文出音的音义著作也进行了类似考察,研究其中的“又音”及其他经师注音是否会对音义作者的语音系统造成破坏。2007年,鲁国尧先生要我统计中古韵书的音节。此时,我正考虑让研究生通过“又音”考察其对原音节系统的影响以何种标的为有效的参照问题,鲁先生的命题正好启发了我,于是撰写了《中古韵书、韵图的音节》。该文分别统计了“王三”、《广韵》、《韵镜》和《七音略》的音节,并对四部书的音节数作了比较,对四部同一系统的韵书、韵图间的音节差作了分析。该项成果可为研究中古“又音”等“冗余”形式提供参照,也可为研究汉语发展中音节变化提供参考。从研究生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又音”等“冗余形式”对各种文献原有的语音系统造成实质性的破坏,而且各种文献的音系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从而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即《切韵》系韵书的音系不是“综合”性质的音系;再结合陆法言“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欲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的主张,得出无论“广文路”还是“赏知音”,都不可能用于规范方言口语,而是作为讽读经书、撰作诗文的标准结论。因此,对《切韵》音系的性质不难作出判断:《切韵》是南朝后期陈隋之间文人士子标准的读书音音系,这个音系不是综合音系,而是以“洛下”传入“金陵”的“帝王都邑”的标准读书音为基础的语音系统。这一结论,是对周祖谟先生《〈切韵〉的性质和他的音系基础》所主张的《切韵》音系“是六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重要支持和补充。

本集中还有一组研究《韵镜》、《七音略》等早期切韵图的论文。我对《韵镜》等早期切韵图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蒋希文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古音研究,分别给学生布置了研究报告,我和刘春生分到的题目就是比较《韵镜》与《七音略》的异同。记得有一次图书馆处理书籍,我买了一本《韵镜》,李晔先生和蒋希文先生又不约而同地各自给我买了一本,或许这

就是我跟《韵镜》的缘分？李新魁先生的《韵镜校证》出版后，我就每天认真阅读，还把其他韵书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写在天头地脚。时间一长，这部书整个散开了。为了把这些内容保存下来，于是我撰写了《〈韵镜校证〉补正》一文，并投到《贵州大学学报》。由于学报严格控制稿件的字数，我只好截取了文章前半部分由学报刊发。1996年，鲁国尧先生到贵州大学主持答辩，我作为答辩委员会秘书，因而跟他有了较多接触。我把这篇文章和《〈集韵〉见溪疑影晓五纽反切上字的分用》送请鲁先生指教，先生看过以后大加赞赏，对我说：“我真不知道在贵州还有这样一个年轻人能如此做学问。我一定要让学术界知道贵州有这么一个做学问的年轻人，绝不能把你埋没了。”我告诉先生自己希望继续研究《韵镜》，但不知还有无价值。先生说：“当然有价值。你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我对先生说了寻找资料的困难，先生说：“只要你做下去，资料是我的事，研究是你的事。”于是我有了继续研究《韵镜》并为《韵镜》作一个新的校注本的信心。1999年，我到南京大学鲁先生处做国内高级访问学者，到达南京的第二天，丁志民带我到南秀村先生的家里，先生把事先准备好的一袋子书递给我说：“看看对你研究《韵镜》有没有用？”我打开一看，有日本汲古书院《六地藏寺善本丛刊》第五卷、《古代韵学资料》等许多从来没有听到过、见到过的书籍，我翻开六地藏寺本古写本《韵镜》，如获至宝，不肯放下。先生说：“现在别看了，我们聊聊天。一会你把书带走，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其他还有，但是我的书太乱，一时找不到，只好以后陆续给你。”为了研究《韵镜》，先生还要我开书目，由他发动国内外朋友一起帮助寻找。他还经常把海外寄来的资料直接给我。储泰松等看见我手中还没有拆开的邮件往往非常羡慕，说先生如此为学生找资料，除我以外还从来没有过。在南京的这一年，对我非常重要。一方面通过向鲁先生请教，逐渐了解了他的语言学思想，对“层累”学说的接受也从半信半疑到坚信不疑。一方面又能在很好的学术环境里心无旁骛地进行研究。鲁先生要我既作《韵镜》，索性同时为《七音略》作一个详注本。我在南京图书馆和南大图书馆半个月就找到《七音略》近10个版本，并完成了各本的校异，难免感慨效率甚高，颇有如鱼得水之势，这在贵州是难以想象的。看到厚厚的校勘记，鲁先生自然也非常满意。南京一年，我完成了《韵镜》、《七音略》长编，为后来撰写《七音略校注》和《韵镜校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南大，我跟储泰松几乎是朝夕相处，常常一起讨论音韵

学、语言学问题。泰松的功底极为厚实,无论是诗文韵部的归纳、反切材料的系联,还是梵汉对音研究,都有很深的造诣。我在跟他的频繁讨论中获得的启发和收益都很大,后来我们合作撰写了几篇文章。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黄笑山、刘晓南、汪维辉、何亚南等一批已经在汉语言文字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同行专家,跟他们的交往对我以后的研究大有裨益。

回到贵州以后,《七音略校注》和《韵镜校笺》先后出版。在此期间,我发表了几篇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论文,分别解决了《韵镜》的“开合”与“内外”问题。由于前人的研究忽略了文献本身的体例,把文献的错讹误认为语音问题,从而使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以致造成近百年的争论。我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尊重古代文献自身的体例,让研究回归文本。重视古书的条例并有效解决历史留存的问题,即颜之推所谓“櫟栝有条例”,是清代皖派学术在继承与光大汉代学术精华而获得的创新,也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在比较诗学界,曾经有过“回归文本”的主张,这是要求诗学与艺术哲学重归文学本体的思想历程。而在汉语言文字学界尤其是汉语音韵学界,由于记载了大量汉语信息的古代文献因阅读的困难而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导致了大量语言信息被严重误读与误解。甚而有人通过古代文献研究语言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用古代文献研究语言已是昨日黄花等等。如果外国学者这样认为尚可原谅,因为文化的差异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献存在“隔膜”。如果中国的学者这样认为就不可原谅,因为忘掉了几千年的文化、并带着与外国学者一样的“隔膜”看待和评价自己的历史,显然是数典忘祖的行为。重新审视被一些学者认为已经被研究得“差不多”的文献,真正被理解并研究透的不是太多,而被误读、误会、误解、误说的反倒俯拾皆是。例如把不早于唐代孙强改定本《玉篇》的《篆隶万象名义》音系作为梁代顾野王的原本《玉篇》音系;以唐宋人屡经删改增损的《经典释文》“首音”作为考订陆德明《经典释文》音系的基本材料等等,莫不如此。究其原因,即在于对古代文献内在条例,存在生疏与漠视两端。生疏则往往视而不见,失之于“隔”;漠视则往往自我作古,失之于“勇”。科学的精神是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尊重各种古代文献的内在条例”并根据事实作出客观、正确的解释,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应该坚持和努力的。后来在2006年,我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韵镜》再研究”(02BYY023)结项时被定为“优秀”

等级,该项目的最终成果《韵镜校笺》又于2009年先后获得“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和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我以为获得“王力语言学奖”是对我多年坚持“层累”学说进行研究的最高奖励,因为我自走上学术道路的第一天,就是读着王先生的著作如《汉语音韵学》、《汉语史稿》、《汉语诗律学》、《同源字典》、《龙虫并雕斋文集》等成长起来的。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研究领域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在汉语同源词(同源字)研究中卓然独立,成为“新训诂学”的里程碑。获此殊荣,则可将自己的名字永远附骥于大师名后,不啻李贺《高轩过》所云:“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20多年前,我在跟李晔先生攻读文献时就对《经典释文》产生浓厚兴趣。李先生多次告诉我今本《经典释文》中有许多后人添加的内容,并要我读《先秦经籍考》里的有关文章。我当时就有弄清《经典释文》的想法,但是由于学术功力的欠缺和文献资料的匮乏,因而久久不能实现。2000年,我到徐州参加音韵学年会,提交了一篇《今本〈释文〉中后人所增改的反切举例》,就是清理《经典释文》音切的尝试。后来我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对《礼记音义》中后人增改的音切研究。到了安徽大学以后,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学术交流,研究的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我终于有机会系统实施《经典释文》的研究计划了。我先后就这个计划向鲁国尧先生、赵振铎先生讨教,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又跟黄笑山、虞万里、储泰松、黄耀堃等师友反复磋商,就其可行性征求意见。同时先后撰写了几篇文章,《〈周易音义〉〈尚书音义〉重音音切研究》讨论了今本《经典释文》中“重音音切”的性质问题,首次指出发现这个问题并严加批评的是南宋的岳珂。同时又以无主名的“首音”往往是一个“音和切”而有主名的“次音”每每为“类隔切”的事实为线索,论证了这些在用字上极有规律的“重音音切”并非陆德明为保存“读音相同而用字不同”的反切造成的,而是在唐宋时期语音演变导致古反切产生“类隔”现象,而使时人拼合时产生不和谐后,在原来的“类隔切”前增加一个“音和切”的“首音”导致的。因此,在今本《经典释文》的各种反切材料中,对考订陆德明语音系统最不可靠且最需逐一甄别的就是“首音”。如果不加筛选而以“首音”考订陆德明的语音系统,得到的必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音系。最近我在研究日本奈良兴福寺所藏古抄本《礼记音义》残卷时,发现数十条今本有“重音”而古本无、今本为“音和切”而古本为“类隔切”,以及诸多今本增、删、刊、改古本的证据,使我得出的